

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考

彭小瑜

潘岳同志给《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作序，讨论的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同时也由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了现代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困难局面，即刻意制造族群多元和文化多元带来的沟通障碍，以及这类沟通障碍经常导致的分歧和冲突，彰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历史的和现实的真相。序言所表达的观点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善意提醒，敦促人们去思考：文化多元主义还能够走多远；文化多元主义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究竟应该如何评估。

族群融合以及主流文化引导下的民族国家统一是世界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普遍、稳定和持久的情况，也是古代世界一些发达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萌生和发展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历

时不长，但是已经对传统形成了严重的挑战，给东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和谐带来了威胁和破坏，其负面效应可能还在进一步地加深和扩大中。将文化多元主义简单地看作时尚和理所当然，是一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价值观，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地由学术的立场去进行历史分析。批评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是否认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应该是复杂和丰富的，绝不是要有意缩小或者取消民族国家内部群体的差异性和生动活泼的多样性，而是要将多元文化置于团结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脱离了这一语境的文化多元主义破坏民族国家团结，具有不健康的碎片化效应。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世界各地的暴力、战争、分裂以及连带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背后，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踪影。

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神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和政府处理族群关系的工作模式之一，逐渐在西方和世界各地获得多方面的影响。文化多元主义，相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长期使用于族群关系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出现得比较晚，不仅其时段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观察，其负面效应也应该得到重视和纠正。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代表性学者里面，不少是由善意出发提出社会改革路径。譬如在欧美国家，他们希望纠正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长期遭

受的歧视，检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等本土原住民进行剥削、压迫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问题是，由于现代西方国家内部复杂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经济利益博弈，文化多元主义并不停止于社会精英阶层因为负罪感而对历史问题进行的检讨。

文化多元主义遭遇的质疑和重大挑战，恰恰发生在将之运用于处理现代国家族群关系的时候，将之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的时候。在近代欧美国家的历史上，长时段地看，处理族群关系的文化态度和社会政策并非是文化多元主义，而是强调民族国家认同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也就是希望不同的族群认同既定的主流文化，或者共同建立一个包含多个族群传统的新的共同文化。两种模式下的政策导向都是促进一个以公民群体为核心的现代民族的形成。在同化模式下，少数族群会接受和融入主流文化，但是会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在熔炉模式下，各个族群不仅携手创造统一的新民族文化，而且各自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历史传统。前述两种模式所引导的社会政策都旨在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凝聚以及文化传统的交融和多样性，但是部分学者以及少数族裔群体对这两种模式的认同和支持的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了变化。

文化多元主义并非没有正面意义。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语境里，这一思潮起码具备两大建设性的

贡献。一是增加了社会在整体对种族歧视的敏感度，并因此在道德和态度上有积极的改良，在立法和司法上有相应的举措。二是民众和学者对多样的族群文化遗产有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

问题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和处理族群关系有天然的缺陷。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就已经在担忧，文化多元主义强化的族群认同会引导一个社会忽略真实的社会平等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而伤害到弱势群体的利益。

潘岳同志在写给《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的序言里面说，“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这里所说的“情感”，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指认同中华民族的情感，指超越特定族群的狭隘性以构建大中华民族的行动意愿。中西古代的历史由不同的角度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近现代世界和欧美的历史进程也指向同样的规律：在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引导下，加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加强各个族群的共融和团结，而不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强调单个族群的特性和特殊利益，才是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昌盛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深沉的情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切实保障。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杰

《包拯家训》：三十七字，字字珠玑

包拯（999年—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时期的名臣。

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曾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官职，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享年64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乃中国历史上清官廉吏之典范。他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深受百姓的爱戴。从南到北，全国许多地方都建有纪念包公的祠庙，到处都有人在祭祀他。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他的传说，关于包拯的事迹很多都被改编成了小说、影视剧。民间传说包拯可审判上至天上的神，下至地狱的小鬼，日审阳，夜审阴，死后还被派往阴间做了阎罗王，可见民间对包拯评价之高。

那么，被誉为“三十七字，字字珠玑”的《包拯家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从中可以受到怎样的启示呢？

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姓之中。不从我志，非吾子孙。”

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琬珙石，鉴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肃之子也。

这段文字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

包拯在家训说道：“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撤职的人，都不允许放回老家，不许走进包家大门；他们死了以后，也不允许把他们埋葬在包家的坟地上。凡不遵从我的志愿的，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

原文共有37个字。在家训的后面，包拯又写道：“希望包珙把上面这段文字刻在石板上，并把刻石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用来告诫后代子孙。”原文又增加了这14个字。包珙是包拯的儿子。

此家训并非包拯的遗嘱，而是正当他身居高位之时所写，让包氏后裔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廉洁奉公。

《包拯家训》的核心思想是做人不能贪图功名利禄，为人要诚实正直。这一严厉的家训，体现了包公的高尚情操，既是他规范子孙后代的戒条，也是他自己一生的行动准则，给我们刻画出一个个疾恶如仇、惩恶扬善的清官形象。早年他调任庐州知州时，家乡亲人都很高兴，以为可以从包公身上沾点光，可以光宗耀祖。他的娘舅觉得外甥来当官，自己犯点事也无大碍，会得到照顾。谁知包公毫不留情，照样开庭审讯，并依法责打数十大板，从此，亲朋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仗势胡来。

这则家训传承了900多年，成为世人瞩目的金科玉律，也意味着其后裔承领着祖先的风光荣耀，同时也要经得住公众的监督和审判。包氏宗族的这种清凉遗风至今犹存，世代子孙一直恪守着家训：包公的次子包绶48岁那年，赴任潭州通判，在路途上病故。打开他的箱子，“除浩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日后计者”。只好把他携带的墨砚、印鉴、碗罐等，置于棺木中埋葬。1973年，清理包绶墓，诚如史籍所载，仅从墓中取出这些极简单的遗物。他的夫人文氏，是当朝副相文彦博的小女儿，身世显赫，却也是“赋性寡欲，常不茹荤，以清静自将”，严格遵循包拯的家训。包公的孙子包永年历任县主簿、县尉、县令等职，“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死后，清理他

的财物，“了无遗蓄”，丧葬费用还是两位堂弟资助的。做官做到如此廉洁，包氏门风这么清白，怎能不为后人感叹。

包绶、包永年两代子孙，以及崔氏、文氏等子媳，弘扬祖德，身体力行，使包拯的遗志得以实现，形成了包氏家族的“孝肃家风”。包绶墓、包永年墓，以及夫人和子媳之墓，都葬于包拯墓之侧，得到后世同样的敬仰。若有犯脏滥者，生不得还家，死不得归葬，这话说得多么绝情。其实，在某种场合，绝情何尝不是一种至爱。这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敢懈怠，终不愧为包拯子孙。因此，包拯是清官的典范，“孝肃家风”亦是清官家风的典范。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始来者羞。”这是包拯在端州出仕时写的一首戒廉诗，突出反映了包拯的为官之道和做人原则，体现了包公的“为民者愿”“为政者师”。令人叹服的是，包拯祖孙三代都没有做过下让后人感到羞愧的事。如此清正的家风离不开包拯三十七字家训的精神融入其为人、为子、为父、为官的生活中。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端蒙养、重家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包拯家训》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适用，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党员干部要带头管好自家的家人，将廉洁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家属的教育引导，使他们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权力，谨慎交友，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自觉做到“严于律己、洁身自爱”，让崇廉尚洁、厉行节约的家风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传承。

一个干部贪图私利则难以立身，一个国家腐败不除则难以立国，一个政府贪污不除则难以立信，一个执政党不除贪污腐败这个毒瘤，则难以立本。眼下，我们重提家训、家规、家教，就是要从包拯《包拯家训》等在内的历代优秀家训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廉洁齐家”，以家庭倡廉促政治生态持续好转。故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国风清。好的家风家训，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航标。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就不会在以后的人生大海上迷失方向，就会走得更好。

《包拯家训》的内容，虽然只有寥寥三十七字，但是字字珠玑，万古流芳！它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足为世人风范，令人肃然起敬。“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果果清名，万古不磨。”这世代流传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包拯的赞美、景仰和无限的爱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平“语”近人》思想解读嘉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

李荣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了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智慧，奠基了一条通向人类可持续发展与繁荣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人类整体，超越了当下而面向未来，真正依靠人民而又关怀人民，既面向国际又面向国内，是开放而包容的理论体系。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认同，文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所有的文化内容之中，文学是最具有传统性与体系性，文化差异性、交流可能性与世界共通性的类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市场的世界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继承与繁荣民族文化之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文学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制度差异，实现平等的对话、交流；文学的“人文关怀”属性和情感性的共通性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理解、共鸣，以及文化差异的接受与心理认同，从而使文

学成为“世界语言”。

在世界各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感的形成中，文学具有优势地位。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中说：“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性、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趋于无序的、非预期的全球化浪潮中，经济的、政治的方式本身就夹杂着利益冲突，文学的“和同”功能，最易于消除文明隔阂、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互鉴、共存，在审美性对话与交流活动中，冲决捆绑与束缚人们的重重观念的牢笼，并借由持续性的“想象与建构”不停地“重现”，最终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到人们的实践与行动之中。

中国现当代文学处于探索与转型过程中，累积呈现出了不少深层次问题。其中一大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因素被继承、熔铸的总体程度不够，具有明显的因应刺激、因类比附的痕迹，距离真正意义上深度融合、开陈出新，尚有距离。文学技巧上

的创新与融合相对较易，文学观念与价值理念上的创新融合却很难，一方面导致了文学理论话语缺乏民族性，另一方面使文学蕴含的价值理念也缺乏民族外向性。第二个表现是，过度追求文学题材的地方化、文化的民俗化、语言的地方化，又与作者缺少全球性视野、思想上缺乏深入的现代性交织在一起，导致难以顺畅地阅读，难以准确地理解。同时，文本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第三个表现是文学关怀向度上的。在当前现代性、全球化问题层出，人类命运非预期、复杂难明的状况下，文学要呈现人类的时代性问题和处境，在巨大的焦虑中寻求可能的前进方向和拯救之途。只有作者真正拥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眼光，才能立足于、却又不至于本民族的关怀向度。

因应着使命，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必须要做出深层次的转变。首先，要将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还原到其历史语境中，将以西方化的理念为预

设的理论立场，转换为对现代化全球性深入推进过程中存在迷途和危机的深层次揭示，以及对拯救可能性的探索。其次，将人类关怀纳入民族性的叙写之中，民族性的经验与问题在最深刻的人类关切中才能彰显其特异性与问题存在价值。如何借助民族性的经验与问题，以揭示现代性、全球化深入推进过程中的人类境况，真正达到人类命运一体，是尤其要着重的。最后，没有任何地区和民族，孤悬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之外，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复杂问题，虽有区域和民族差异，但却具有共通性和借鉴意义。在这一思想域中来思考与解决，本身就具有对全球性共识的价值理念探索的意图。

文学要以想象和建构的方式，立足于本土经验，调动民族智慧和人类的一切可用智慧，来描述和探求现代化的全球性深入推进境况及问题，以对人类自身的极大关怀，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认同的形成。这也激励着中国当下的文学写作者，要走一条艰辛奋斗的路。

（作者系商洛学院副教授）

“闻道未迟——沈鹏诗书画作品展”开幕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闻道未迟——沈鹏诗书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沈鹏作品近80件，包括中国美术馆旧藏、新近捐赠以及自藏作品，还有从其他途径借展作品，沈鹏历年出版的画册、文稿、诗稿在展览中亦有精彩呈现。

沈鹏是当代书坛巨擘，他的书法艺术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以“中和”为旨，续接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此次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之一。2019年，沈鹏向中国美术馆捐赠20幅书法精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表示，辛丑牛年是沈鹏先生始背之年，以“闻道未迟”作为诗书画展的主题，足见先生在问道求真之路上的谦逊与不懈，以及沈先生为人为人艺的人

生高境。展览还展出了沈鹏和吴为山合作的《斥笔图》和《路遇图》，两人以诗书画相酬，珠联璧合。（谢颖）

《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0）》在京发布

近日，庆祝建党百年中国历史研究院系列成果发布会首场：《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0）》在京举行。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2019年中国历史学研究报告》以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中国古史学、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史、考古学6个学科分报告组成。报告还通过大数据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五件大事、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五部优秀著作和十篇优秀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表示，中国史学界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

律，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史学，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智慧。

据悉，《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主持编写，旨在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进展，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1）》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中，将于年内公布出版。（郭海瑾）

《“最美奋斗者”丛书》弘扬崇高精神

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最美奋斗者”丛书》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中国作协、中宣部宣教局、中宣部出版局、中宣部文艺局的1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部分作者出席会议，围绕丛书创作、报告文学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2019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九部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授予张富清等278名个人、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等22个集体“最美奋斗者”称号。书写和宣传这些优秀的时代劳动者，是新出版人的使命和担当。本套丛书共10册，包括《祖国至上》《面对大海的诉说》《英雄路漫漫》《一枚铺路的石子》《此心此念》《大道健行》《军姿如山》《为了万家灯火》《特殊的勋章》《幸福是什么》，讲述了80位“最美奋斗者”的故事。其中既有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等历史上的楷模，又有黄大年、南仁东、罗阳等新时代的楷模；既有两院院士闵恩泽、诺奖得主屠呦呦这样的科技人才，也有导游文花枝、“守岛人”王继才等在普通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的模范人物。

丛书作者包括何建明、李春雷、王宏甲、黄传会、刘国强等几十位报告文学名家，大力弘扬“最美奋斗者”的崇高精神和价值追求，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的价值理念。（谢颖）